



苏曼殊小说论

裴效维

生年短暂的苏曼殊(1884—1918),是一位具有多方面才能的近代作家。他兼工诗、文、小说和绘画,精通英语、日语和梵语。他曾用风格别致的作品为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服务,且翻译、撰述、编辑过多种中外文的文学作品和学术著作,在我国与世界文化交流史上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在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他的作品曾以专集、合集、全集的形式大量出版,文坛上一时出现了“曼殊热”的情况。与此同时,日本人也对苏曼殊甚感兴趣。五十年代以后,苏曼殊在香港和台湾仍有很大影响。他的名字更引起了国际性的注意,英国有人研究他,纽约、伦敦出版的三种大型丛书都为他立传,苏联也翻译了他的小说《断鸿零雁记》。遗憾的是,我们在解放后的三十年内,却对这样一位在历史上起过积极作用并具有世界影响的作家采取了极其冷淡的态度,他的作品散失殆尽,研究他的文章更是寥若晨星。以致不仅一般读者不知道苏曼殊的名字,甚至有的专业文学工作者也对他相当陌生。近几年虽然发表了一些有关苏曼殊的文章,但多数属于一般介绍,且在史料运用上常常出现真假不分的现象。这一切说明,对苏曼殊进行深入研究还是很有必要的。本文只对他的小说作品作些初步探讨。

—

苏曼殊的小说作品,流传下来的共有七种,除上述《断鸿零雁记》外,计有《惨世界》^①、《天涯红泪记》(未完)、《绛纱记》、《焚剑记》、《碎簪记》和《非梦记》。《惨世界》发表于一九〇三年,是作者的处女作;其他六种发表于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一七年,是作者晚年的作品。这种情况说明两个问题:一,苏曼殊的小说创作,贯穿于他作家生涯的始终。因此,这些小说作品对于研究苏曼殊一生的思想具有重要价值。二,这些小说作品,恰好产生在辛亥革命前后,即在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后十几年。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把它们放在这一特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加以评价。

苏曼殊写作《惨世界》的一九〇三年,正当资产阶级革命思潮高涨之际。一方面,“苏报案”的发生,进一步暴露了清政府的反动本质,促进了反清运动的发展。另一方面,

^① 《惨世界》(又名《惨社会》和《悲惨世界》)一向被人认为翻译小说,其实它是借用雨果《悲惨世界》里的部分人物和故事,并取材于晚清社会的一部创作小说。关于这个问题,笔者另有专文论述。

拒俄运动的广泛开展，又激起了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促进了反帝运动的发展。从苏曼殊本身看，当时也是他一生中思想最激进的时期。就在他写作《惨世界》之前的一年多时间内，他在东京参加了中国留日学生组织的三个革命团体：一是以排满为宗旨的青年会，二是以反帝为宗旨的拒俄义勇队，三是由拒俄义勇队改组、以反帝排满为宗旨的军国民教育会。当他的这些革命活动遭到了他的留学资助人林紫垣的激烈反对并以断绝资助相威胁时，他便不惜中辍学业和丢掉饭碗，毅然回国，并与林紫垣一刀两断。回国不久，即参加了章士钊、陈独秀等人在上海所办的革命报纸《国民日报》的编译工作。《惨世界》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和作者这样的思想状况之下产生的，因此，作品所表现的排满、反帝、反封建的思想异常激烈。这些激烈的革命思想，主要是通过金华贱和明男德这两个人物反映出来的。

金华贱的原型是雨果《悲惨世界》里的主人公冉·阿让，苏曼殊根据晚清社会的现实，将他加以改写，借他反映晚清劳动人民的苦难生活。作者通过金华贱为了全家活命，拿了人家一块面包，便被当作“贼”而坐牢十九年，以及出狱后仍然走投无路的悲惨遭遇，对统治阶级进行了控诉，对劳动人民表示了同情。作者借作品人物之口说：“世界上有了为富不仁的财主，才有贫无立锥的穷汉。”“世界上的人，除了能作工的，仗着自己的本领生活；其余不能做工，靠着欺诈别人手段发财的，哪一个不是抢夺他人财产的蠹贼呢？这班蠹贼的妻室儿女，别说穿吃二字不缺，还要尽兴儿的奢侈淫逸。可怜那穷人，稍取世界上些东西活命，倒说他是贼。这还算平允吗？”这就从根本上揭露了封建制度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反动本质，从而客观上向人们揭示了这样一个道理：只有打倒剥削阶级，推翻封建制度，穷人们才有活路。这就是金华贱这个人物在当时的社会意义。

明男德是《惨世界》着力描写的正面主人公，作者把他塑造成了一个略带侠客色彩的革命英雄的形象。明男德具有热爱祖国、同情人民、痛恨黑暗现实的鲜明感情。他为祖国沦入“悲惨世界”而痛心疾首，又“为着世界上的穷人不平”而大声疾呼。因此，凡是危害祖国、欺压和愚弄人民的黑暗势力和落后观念，如皇帝、孔子、官吏、富人、封建顽固派、假爱国志士、汉奸洋奴、宗教迷信、封建道德等等，无不是他挞伐的对象。其中最激烈的如：痛斥清朝皇帝是“抢夺了别人国家的独夫民贼”；大骂孔子的学说是“狗屁”不如的“奴隶教训”；揭露富人是“抢夺他人财产的蠹贼”；甚至公然声称：“为人在世，总要常时问着良心就是了；不要去理会什么上帝，什么天地，什么神佛，什么礼义，什么道德，什么名誉，什么圣人，什么古训。”明男德不仅是一个批判家，而且是一个革命家。他以救国救民为己任，把“救这人间苦难的责任”统统揽在自己“一人身上”。于是只身漫游，见义勇为，智劫监狱，暗杀官吏，惩恶锄强，救困扶危。但是实践使他认识到，光靠个人包打天下是行不通的。于是他又联络会党，希望用“大起义兵”的“狠辣手段，破坏了这腐败的旧世界，另造一种公道的新世界”。何谓“公道的新世界”？根据他的设想，这个“新世界”将实行下列主要原则：“世界上物件，应为世界人公用”；“取来富户的财产，当分给尽力自由之人以及穷苦的同胞”；全国的土地，应成为全国“人民的公产，无论何人，都可以随意占有，不准一人多占土地”。为了实现这个“新世界”，明男德最后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很显然，明男德这个形象，并非苏曼殊幻想的产物，而是当时刚刚登上政治舞台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人物的真实写照。这个人物所表现的排满、反帝、反封建的强烈情绪，他所积极实行的鼓吹、暗杀、暴动的革命方针，他思想里闪耀的革命理想的光芒，都是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主要特征。即拿暗杀问题来说，虽然孙中山等少数人持反对态度，但绝大多数革命党人都热衷于此道，甚至组织过不少专门执行暗杀任务的机构，仅同盟会就有六个之多。再拿土地问题来说，当时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领袖人物和骨干人物都赞成“平均地权”的主张，并写进了同盟会的革命纲领。其中陶成章的主张尤其彻底，他提出“把田地改作大家公有财产，也不准豪富们霸占，使我们四万万同胞并四万万同胞的子孙不生贫富的阶级，大家安安稳稳享福有饭吃”^①。由此可见，苏曼殊通过明男德这个人物所鼓吹的革命思想，确实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一般思想状况。

《惨世界》问世的时候，正是我国从资产阶级改良运动过渡到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转折时期。当时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主要任务，就是要从思想上和理论上打垮改良主义，以争取人心，扩大革命力量。苏曼殊用自己的《惨世界》参加了这场大论战，通过金华贱和明男德这两个人物，揭露了晚清社会的黑暗，批判了改良主义观点，宣传了革命的政治主张。因此《惨世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小说，而是梁启超所说的那种“政治小说”。这大概就是青年时代的鲁迅喜欢它而清政府却禁止它流传的主要原因。可见《惨世界》在当时是起过积极作用的。

《惨世界》问世的时候，也是我国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文学过渡到资产阶级革命文学的转折时期。苏曼殊的《惨世界》和佚名作者的《洗耻记》、《自由结婚》等在这时候出现，冲击了当时相当流行的改良主义文学（如“谴责小说”），以反帝、反清、反封建的鲜明倾向，宣布了资产阶级革命小说的诞生，标志着近代小说史上一个新阶段的开始。特别是《惨世界》对皇帝、孔子等神圣不可侵犯的人物痛加挞伐，而把向来受轻视的劳动人民和当时最先进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作为正面主人公给以同情或加以歌颂。从这些方面来说，《惨世界》在近代小说史上应占有重要地位。

二

辛亥革命的暂时胜利，曾使苏曼殊误以为这就是他所期待的那个“公道的新世界”的开始，因而一方面发出了“振大汉之天声”的欢呼，一方面又表示要到“千山万山之外，听风望月”。这既反映了苏曼殊对辛亥革命的积极拥护，也反映了苏曼殊被革命的暂时胜利冲昏了头脑，以致产生了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功成身退的出世思想。然而严酷的现实，很快打破了苏曼殊天真的幻想，中国在袁世凯的反动统治下，依然是黑暗世界。理想的破灭，确实对苏曼殊产生了消极影响，使他异常苦闷。然而又使他从幻梦中警醒，对黑暗现实有了较清醒的认识，因而并没有跑到“千山万山之外，听风望月”，而是重新拿起笔杆，除了继续反帝反封建之外，更对窃国大盗袁世凯进行口诛笔伐。

^① 《龙华会章程》，《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出版。

苏曼殊既然是辛亥革命的积极拥护者，并曾对这个革命怀着极大的期望，因而对于窃夺了辛亥革命的成果，拉历史倒退的袁世凯，也就满怀仇恨。孙中山在一九〇三年发动“二次革命”失败后，于第二年在日本另组中华革命党，利用该党机关刊物《民国》杂志进行反袁宣传。苏曼殊也是该杂志的编辑和撰稿之人，他在上面发表了《讨袁宣言》和小说《天涯红泪记》。《讨袁宣言》义正词严，对袁贼祸国殃民的罪行作了淋漓尽致的揭露：“擅屠操刀，杀人如草。……辱国失地，蒙边夷亡。四维不张，奸回充斥。上穷碧落，下极黄泉，新造共和，固不知今真安在也！”并庄严宣誓：“衲等虽托身世外，然宗国兴亡，岂无责耶？今直告尔：甘为元凶，不惜兵连祸亟，涂炭生灵，即衲等虽以言善习静为怀，亦将起而颺尔之魄！”同年秋冬，他在三封信的末尾或署“宣统”的年号，或并署“皇帝宣统”和“洋皇帝”的年号，对袁世凯给以辛辣讽刺，其意是说：袁世凯和清朝皇帝是一丘之貉，民国和清朝乃半斤八两。一九一五年，苏曼殊听说山东护国军起兵讨袁，又立即赶赴青岛。

苏曼殊的这种强烈的反袁思想，在他的小说里也有明显的反映。他的《焚剑记》表面上是言情小说，实际上是《讨袁宣言》的注脚和形象化。作者以独孤槩和阿兰的爱情为中心线索，把他的笔锋伸向了当时社会的各个方面，其中比较突出的是：通过阿兰、阿蕙、眉娘和一个老妓女悲惨遭遇的描写，说明袁世凯反动统治对广大妇女的严重摧残；通过官兵屠戮无辜百姓的描写，控诉袁世凯“杀人如草”的滔天罪行；通过官兵和百姓“以人肉为食”的描写，揭露袁世凯统治下经济破产、社会崩溃的黑暗现实。

有人认为，《焚剑记》描写的是“晚清社会”。这是一种误解。其实，苏曼殊就怕读者误解，所以特意把故事发生的时间交代得一清二楚。书中说，主人公独孤槩为避某权贵迫害，于“宣统末年”（1911年）由家出走，“为人灌园”。等到“南境稍复鸡犬之音”（当指辛亥革命胜利之初社会的相对安定），又入山住了“三更秋”。此“三更秋”者，又当指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一四年。作品更写了“三更秋”以后的事，这就更到了一九一五年了。由此可见，《焚剑记》写的恰恰是袁世凯统治下的社会，而不是“晚清社会”。

袁世凯的“洪宪帝制”于一九一六年三月破产，袁世凯也于同年六月忧惧而死后，苏曼殊对他依然恨恨不已，他在同年十一月发表的《碎簪记》里，更指名道姓地抨击袁世凯强奸民意、帝制自为的倒行逆施。书中写到“袁氏欲帝之日”，曾指使他的爪牙们起草了一篇“通告列国文件”，其中“盛载各省劝进文中之警句，以证天下归心袁氏”。书中主人公庄湜因为拒绝把通告译成法文，并拒绝在通告上签名，便被无理逮捕。

辛亥革命以后，苏曼殊对帝国主义的认识比早期有了一定的提高。一九一二年二月，荷兰殖民地爪哇岛泗水市的华侨集会，庆祝南京临时政府成立，遭到了荷兰当局的血腥镇压，死伤数十人，被捕千余人。荷兰殖民主义者的暴行，激起了全中国人民的愤慨，南京政府也出面交涉。苏曼殊也发表了杂文《南洋话》，谴责荷兰殖民主义者“戮我华胄，辱我国旗”的罪行，提出了“非废却一切苛则弗休”的要求。一九一六年，他更在小说《碎簪记》里揭露了美国资产阶级“两块钱总比一块钱好”的拜金主义，并进而指出：“人谓美国物质文明，不知彼守财虏，正思利用物质文明，而使平民日趋于贫。”在当时人们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普遍缺乏正确认识的情况下，苏曼殊的这种认识特别显得难能可贵。

不过，就苏曼殊晚期小说的整体来说，最主要的思想价值还在于它们对封建礼教的

批判。一般来说, 这些小说都能通过爱情婚姻悲剧的描写, 揭露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

这些作品所描写的爱情婚姻故事, 大体可作如下概括: 以封建家长为一方, 以要求个性解放和爱情婚姻自主权的男女青年为另一方, 双方发生冲突, 最后以悲剧结局: 男女青年或者死去, 或者出家。作品通过具体描写告诉读者, 这些悲剧的造成, 根本原因在于青年们要求个性解放和爱情婚姻自主权的行为, 违背了封建礼教门当户对的原则, 也就是违背了封建家长们的根本利益。例如:《断鸿零雁记》里三郎和雪梅的悲剧, 是因为三郎“家运式微”, 因而雪梅的父母中途悔婚;《碎簪记》里庄湜和灵芳的悲剧, 是因为灵芳一贫如洗, 因而庄湜的叔婶坚决反对;《非梦记》里海琴和薇香的悲剧, 是因为薇香的父亲是穷画家, 因而海琴的婶母百般破坏;《焚剑记》里独孤粲和阿兰的悲剧, 是因为独孤粲“穷至无裤”, 因而阿兰的姨母从中作梗。由此可见, 这些封建家长为其子女择配的唯一标准, 就是看对方家庭是否富有。对于这一点, 封建家长们以为天经地义, 因而直言不讳。阿兰的姨母说:“语云:‘竹门对竹门, 木门对木门。’”“公子(按指独孤粲)佳则佳, 然其人穷至无裤, 安足偶吾娇女?……此婚姻之所以论门第。”海琴的婶母也说:“薇香但善画, 需知画者, 寒不可衣, 饥不可食; 岂如凤嫔家累千万, 门当户对者耶?”雪梅的父亲更认为:“女子者, 实货物耳, 吾固可择其礼金高者而鬻之。”这种纯粹把儿女当“货物”、视婚姻为生意的所谓“门第观念”, 同地主阶级正统的门第观念(除家庭的贫富之外, 还包括出身的贵贱、社会地位的高低等)已经大不相同。这反映了生活在清末民初的地主阶级, 由于受了商品经济和资产阶级的影响, 已经逐渐资产阶级化了。我认为这正是苏曼殊的小说比较真实的表现。

不仅如此, 苏曼殊的有些小说, 还把男女青年的爱情婚姻悲剧同反动官府联系了起来。比如在《非梦记》里, 海琴的婶母为了破坏海琴和薇香的婚姻, 而让海琴娶那个“家累千万”的风嫔, 竟“以薇香诱生讼于官”。官府不问青红皂白, 便把薇香关入监牢。可见在青年们与封建家长们的矛盾冲突中, 反动官府是封建势力和旧礼教的后盾。这就不仅揭示了男女青年爱情婚姻悲剧的必然性, 而且进一步揭露了封建势力和旧礼教的反动本质。

如果说在我国文学史上, 封建势力及其礼教制造爱情婚姻悲剧已经是一个不知重复了多少次的老主题的话, 那么在苏曼殊生活的时代, 资产阶级摧残青年人爱情婚姻幸福的事却还是一个很少被人触及的崭新主题, 因为当时的中国资产阶级刚刚形成, 这个问题还表现得并不突出。苏曼殊却已经敏锐地看到了这个问题, 并及时在他的小说里加以反映。如《绛纱记》描写两个合伙经商的华侨资本家, 起初为了巩固他们的合伙关系, 主动为晚辈穿针引线, 并为他们正式订婚。可是一当其中一个把另一个搞得破产之后, 便立即撕毁婚约, 致使一对恋人一死一僧。

恩格斯说:“在一切历史上主动的阶级中间, 即在一切统治阶级中间, 婚姻的缔结,……是一种由父母安排的、权衡利害的事情。”^①苏曼殊当然不可能在理性上认识这一点, 但由于他忠实于生活, 所以通过对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对待爱情婚姻的态度具体描写, 客观上表现了这一点。这种“权衡利害”的剥削阶级的婚姻观, 如今在一部分大

^①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 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的头脑中还根深蒂固，因此，苏曼殊的爱情悲剧小说，不仅有历史的认识价值，而且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有一种意见认为，苏曼殊“没有把自己的愤怒化为火焰，勇猛地烧向黑暗势力，相反，把主人公引向凄死和出家的末路，结果也就未能深刻揭露悲剧的原因，从而大大地降低了小说的社会意义”^①。诚然，从逻辑上推论起来，苏曼殊除了让主人公们死掉和出家之外，似乎还可以给他们安排下列几种出路：一是让他们向黑暗势力妥协，二是让黑暗势力向他们妥协，三是让他们由家出走，四是让他们投身革命。第一种情况在现实生活中是可能有的，然而如果照搬到小说里去，恐怕更要“降低”小说的社会意义了。第二种情况在现实生活中即使有，也是不典型的，甚至是不可能有的。第三种情况曾经有人写过，易卜生的《娜拉》就以主人公娜拉由家出走为结局。然而正如鲁迅所说，娜拉出走并非最后结局，她的最后结局，“不是堕落，就是回来。……还有一条，就是饿死了”^②。鲁迅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个道理，还于一九二五年发表了小说《伤逝》，让书中女主人公子君始而出走，继而“回来”，终于死掉了。既然出走这条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代尚且走不通，那么在苏曼殊生活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代怎么能走得通呢？事实上，苏曼殊也曾作过这样的描写，如在《碎簪记》里让庄凝产生过“逃之一法”的念头，更在《绛纱记》和《焚剑记》里让主人公昙鸾、五姑和阿兰出走过，可是最后还是让他们死掉或出家了。这说明苏曼殊也认识到此路不通。革命当然是青年们争取个性解放和爱情婚姻自由的唯一出路，但在苏曼殊撰写《断鸿零雁记》等小说的民国初年，由于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已经彻底失败，而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又尚未到来，所以除了少数先进分子之外，一般青年是认识不到这一点的。

以上分析说明，在苏曼殊生活的时代，青年们因在爱情婚姻问题上遭到黑暗势力的打击而致死或出家的事情，不仅是可能有的，而且是必然有的。苏曼殊为他的小说主人公们安排了悲剧结局，正是这种社会现实的反映，因而具有相当的真实性和真实性。而且在我看来，这些小说的悲剧结局，恰恰是对黑暗势力最有力的批判，因为这是一种血的控诉，是“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③，因而具有极大的说服力，也正是它们具有社会意义的关键所在。当然也应该看到，苏曼殊小说凄凄惨惨的情调，小说主人公们软弱无力的表现，的确反映了苏曼殊消极悲观的情绪，也会产生一定的不良影响。但是这一方面毕竟是次要的，以此把它们一笔抹煞，显然是不妥当的。

三

众所周知，我国近代由于处在一个历史的转折时期，因而造成了人们思想的极大混乱，即使是当时最先进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其思想也是很复杂的。苏曼殊由于身世奇特和经历坎坷，所以他的思想尤其复杂。他一生都处在内心矛盾的痛苦之中。有时满怀“国民孤愤英雄泪”的愤慨，有时又显出“与人无爱亦无嗔”的麻木；有时自赏“行云流水

① 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门化 1955 级集体编著《中国文学史》第四册，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9 年版。

② 《娜拉走后怎样》，《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3 年版。

③ 鲁迅《再论雷峰塔的倒掉》，《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3 年版。

一孤僧”的洒脱，有时又陷入“无端狂笑无端哭”的苦闷；有时追求“忏尽情禅空色相”的虚无境界，有时又向往“并肩携手纳凉时”的人间生活。加上苏曼殊经历了辛亥革命过程中的许多挫折和最后失败，更促成了他一生思想的退步趋势，增加了他晚期思想的消极成分。苏曼殊思想的这种复杂性和退步趋势，不可能不反映到他的小说之中。因此我们对苏曼殊小说的消极一面，也应该有充分的认识。

苏曼殊早期小说所表现的反清思想，当然也部分地反映了苏曼殊反封建的要求，但主要是他民族主义思想的表现。比如他把清朝看作是满人“抢夺”了汉人的国家，把清朝统治者看作是“杀害”了汉族“祖宗的仇人”，把清政府中的汉人官吏骂作“满洲狗”。可见他积极反清的出发点主要是排满。联系其他作品来看，这一点就显得更为清楚。比如他专门搜集明末清初清兵血洗广东的历史记载而写成了笔记体的《岭海幽光录》，他歌颂郑成功、朱舜水等反清人物，他把辛亥革命推翻清政府叫做“振大汉之天声”等等，都说明了他的积极反清主要是从民族主义出发进行排满。这种排满思想，在当时曾经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地主阶级反满派、人民大众、会党的共同思想，具有极大的号召力量，在推翻清政权的斗争中发挥过积极作用，因而应给予一定的历史评价。然而它又有一定的局限性，也起过消极作用。首先，它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模糊了人们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认识，削弱了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比如与《惨世界》同年出版的资产阶级革命小说《自由结婚》明确提出，“洋人欺我，大半是异族政府做出来的，所以，要报洋人的仇，一定要先报那异族政府的仇。”“要报异族政府的仇，家奴是一定要斩的。”苏曼殊的《惨世界》也没有任何直接反帝的描写，而对于汉奸洋奴和“满洲狗”却大加挞伐。这一切都说明排满思想影响了人们对于帝国主义和汉族地主阶级的认识。

苏曼殊的小说虽然对封建主义进行了大量的、猛烈的批判，可是同时又表现了作者与封建主义划不清界限，尤其表现在妇女问题上。早在《惨世界》里，作者一方面向封建的传统观念猛烈开火，一方面又不自觉地流露出轻视妇女的态度，认为“女人们见识必短，只知道报复私仇”，不懂得“一国的公仇”。在晚期的小说里，更是一方面肯定和赞美追求个性解放和爱情婚姻自由的行为，一方面又一再重复“天下女子皆祸水”、“女子无才便是德”等封建传统观念。作者甚至说：“吾国今日女子，殆无贞操：犹之吾国，殆无国体之可言。此亦由于黄鱼学堂（对女子学堂的蔑称）之害。”他在一封信里更说过：“女子留学，不如学毫儿戏。”为了证明封建道德胜过资产阶级道德，苏曼殊描写了封建淑女的形象和资产阶级自由女郎的形象。前者的代表人物是《绛纱记》里的马玉鸾。作者让她“割臂疗父病”，并为那个由父母指腹为婚的、后来变为坏蛋而被正法的未婚夫守节到底，出家为尼。后者的代表人物是同一作品里的卢氏姑娘。作者让她以恋爱为手段进行诈骗，以致气死了被骗者，她却“与绸缎庄主自由结婚”了。作者把这两个人物放在同一篇作品里描写，显然是为了加强对比效果，以便证明马玉鸾是保持了“华夏贞专之德”的好女子，而卢氏姑娘则是学了“夷女猜薄之习”的坏女人。这是用封建道德批判资产阶级道德的典型例子，反映了苏曼殊对封建道德的留恋。

不可否认，在苏曼殊生活的时代，由于西方资产阶级的影响，象苏曼殊所指出的某些妇女把爱情婚姻当儿戏，朝三暮四，“向背速于反掌”的现象，确实是存在的。苏曼殊

对此加以批判,本来无可厚非。然而问题在于,就当时中国总的情况来看,妇女不是解放得过头了,而是基本上没有解放。因此当时有不少革命党人和进步作家都大力抨击封建道德和落后的风俗习惯,提倡妇女解放运动,如反对缠足、创办女学等等。苏曼殊看不到或不愿意看到这种基本情况,只抓住个别现象攻击妇女解放,暴露了他身上还有一条封建主义的尾巴。还应该指出,当时某些男人堕落的程度更为严重,如多妻、狎妓现象就极为普遍,即如苏曼殊虽以“和尚”自命,却也逛妓院,吃花酒。他既不自责,也不责难其他堕落的男人,却对妇女大加挞伐,要求他们保持“贞专之德”,这也只能说明封建观念在他的头脑中作怪。

苏曼殊与封建思想的藕断丝连,反映了中国资产阶级具有封建性的特点。从这一点来说,苏曼殊的小说也有一定的认识价值。

苏曼殊虽然同情人民大众,痛恨黑暗现实,期待光明世界,但他和当时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一样,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即往往看不到人民的力量,甚至对他们抱着极其错误的看法。比如在《惨世界》里,作者既把金华贱和某商人之妻描写为深受黑暗势力压迫的可怜人物,又把他们描写为见利忘义、恩将仇报之徒:金华贱不仅偷了热情款待他过宿的孟主教的银器,而且抢了一个穷孩子的钱,甚至偷了他的恩人明男德的钱,还企图把他杀死;商人之妻则为了得到官府的赏钱,而出卖了她的恩人明男德。苏曼殊甚至不分青红皂白,把包括人民在内的中国人都看作是“做惯了奴隶的人”,是“把杀害他祖宗的仇人,当作圣主仁君看待”的“贱种”。这种对人民既同情又轻视的矛盾态度,决定了苏曼殊个人英雄主义和失败主义的矛盾思想。比如在《惨世界》里,他把“救这人间苦难的责任”,统统放在明男德“一人身上”,企图把他塑造成一个救世主式的人物,可是到头来却又让他一事无成地自杀了。

苏曼殊写作《惨世界》的时候,虽然对资产阶级革命的前途缺乏必胜的信心,但毕竟并没有完全绝望,还在幻想出现拯救世界的英雄人物和“公道的新世界”。辛亥革命的失败,打破了他的幻想,使他陷入了不可解脱的痛苦之中。于是,他在小说里一方面批判袁世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一方面又虚构“世外桃源”式的幻境,以求精神安慰。例如,《绛纱记》就写了一个“不知是何地”的世界。那里的人们没有姓名,也不知道自己的年岁。他们“不读书,不识字,但知敬老怀幼,孝悌力田而已。贸易则以有易无,并无货币,未尝闻评议是非之声。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焚剑记》和《天涯红泪记》也有类似的描写。从期待“公道的新世界”到幻想“世外桃源”,形象地反映了苏曼殊思想的退步趋势。不过苏曼殊实际上并不相信“世外桃源”的存在,因此他描写了海盗在这个世界里出没,甚至让战争把它毁掉。可见这里只反映了苏曼殊由于辛亥革命的失败而产生的苦闷心情,而不能由此得出苏曼殊逃避现实斗争的结论。

四

在我国近代小说中,苏曼殊的小说以风格独特而著称,这也是它们曾经风行一时的重要原因之一。这种独特的风格,表现在不少方面,诸如研究者公认的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浓厚悲凉的感情色彩、曲折生动的故事情节等等,这里不必重复。不过我认为苏

曼殊小说的独特风格，主要表现在那种半新半旧、半中半洋的表现形式和表现手法。

从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梁启超等人出于改良主义的需要，大力提倡“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和“新文体”运动，致力于文学的改革。这一文学的改革运动，确实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特别是梁启超的“新文体”，曾经发生过极大的影响。而改良主义小说的所谓“革命”，则主要在于从理论上提高小说的社会地位和加强小说的社会作用，在表现形式和表现手法方面，却基本上因袭了我国的传统小说。在这方面贡献较大的，我以为要推资产阶级革命派作家苏曼殊。而苏曼殊所以能在这方面做出一定的贡献，主要在于他对外国文学比较熟悉。

苏曼殊的《惨世界》，袭用了章回体并基本上采用了我国小说的传统表现手法，可见那时的苏曼殊对外国文学还是不熟悉的。后来，他多次漫游日本和东南亚各地，并利用他所掌握的英语、日语和梵语，大量涉猎外国文学作品。仅从现有的材料看，他至少阅读或研究过欧美作家雨果、但丁、拜伦、雪莱、歌德、莎士比亚、彭斯、豪易特、弥尔顿、丁尼生、郎弗罗和印度作家陀露哆、瞿沙等人的作品，还作过一些翻译工作。这一切，开阔了苏曼殊的文学视野，丰富了他的文学表现手段。因此，在他晚期的小说里，便很明显地表现出对西洋小说学习的痕迹。例如：在小说的体制方面，苏曼殊突破了章回体，采用了西洋小说那种比较自由的形式。在故事叙述方面，苏曼殊使用了西洋小说惯用的第一人称的写法，不仅增加了作品的抒情色彩，而且也成为作者安排故事情节的一种手段。比如《绛纱记》全篇不过万余字，却写了四个爱情故事，就因为作品以“我”为线索，使这些故事得以交错穿插，既写出了故事的纷繁复杂，又显得井然有序，枝而不蔓。在人物外貌描写方面，苏曼殊不满足于中国小说多重“神似”的传统写法，特别讨厌描写才子佳人的习惯套语，而适当吸收了西洋小说重视“形似”的外貌刻画。如《碎簪记》对某女郎作了如下描绘：

上衣为雪白毛绒所织，披其领角。束桃红领带，状若垂巾。其短裙以墨绿色丝绒制之。着黑长袜。履十八世纪流行之舄，乃玄色天鹅绒所制，尖处结桃红 Ribbon（缎带）。不冠，但虚鬟其发。两耳饰钻石作光，正如乌云中有金星出焉。

这种从头到脚详加描写的方法，在我国传统小说里当然并非绝对没有，但是相当罕见，而在西洋小说里却是普遍运用的，从而成为它的一个特点。苏曼殊不时采用这种方法，恐怕与西洋小说大有关系。至于在人物心理描写方面，苏曼殊学习西洋小说的痕迹更是很明显的，这里不必赘述。

但是，苏曼殊并不是一个完全模仿西洋小说的小说家，他也继承了中国小说的优良传统。比如他的小说情节曲折，故事完整，很适合中国读者的欣赏习惯，就显然是保持了中国传统小说的特点。在不少地方，苏曼殊更力图把中外小说的长处结合起来。如《绛纱记》这样描写一位女郎：

余细瞻之，容仪绰约，出于世表。余放书石上，女始出其冰清玉洁之手，接书礼余，徐徐款步而去。女束发拖于肩际，殆昔人堕马之垂鬟也。文裾摇曳于碧草之上，同为晨曦所照，互相辉映。俄而香尘已杳。

既有虚写，也有实描；既写外貌、装束，又写神态、风度；同时还用色彩鲜明的景物加以烘托。因此显得简洁而具体，给人以形象鲜明之感。

苏曼殊的这些努力，并没有取得突出成就，更没有象梁启超的“新文体”那样发生过巨大的影响。但是这些努力是有意义的，对于丰富我国小说的表现手段，对于促进新小说的形成，无疑起过积极的作用，有些新文学作家就受过他的影响。

此外，苏曼殊的小说虽然没有塑造出十分成功的人物形象，但这些人物形象在我国文学史上却是并不多见的。比如《惨世界》里的明男德和晚期小说里的主人公们，就是我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出现的两类新人物，由于他们在历史上存在时间的短暂，所以文学作品尚来不及表现他们，他们已经消失了。苏曼殊凭着自己的敏感，才在小说里留下了他们的剪影。而且一般来说，苏曼殊也写出了他们的时代特征和性格特征。即拿晚期小说里的女主人公们来说，作者一方面写出了他们要求个性解放和爱情婚姻自由以及具有一定的叛逆精神的共同特点，一方面又写出了他们的性格差异。比如《断鸿零雁记》里的雪梅就只是以书信表示感情，以自杀表示反抗；而《焚剑记》里的阿兰和《绛纱记》里的秋云就敢于大胆追求，并敢于用出走的方式与封建家长和邪恶势力进行斗争。这类形象，既不同于崔莺莺和林黛玉，也不同于新文学作品中的新女性。他们的出现，在文学史上有填补空白的意义。

苏曼殊的小说，在艺术上也有不少缺点。总的来说，存在某种程度的幼稚性。在具体写法上，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作者常常用议论和插叙打断主要情节，因而显得结构不够谨严。如《断鸿零雁记》第二十一章的七首《捐官竹枝词》，就与主要情节毫无关系，是作者急于揭露现实而硬塞进去的。二是人物描写和故事叙述不尽合理。如上文提到的马玉鸾，既是个留过洋的时髦女郎，又是个十分典型的封建淑女，出现了二重性格。又如上文提到的独孤癸，本来是个弱不禁风的旧式书生，后来却无缘无故变成了走南闯北的侠客式人物，也完全不合乎人物自身的性格逻辑。至于说钢剑可以伸卷焚烧，和尚可以“坐化”之类，更是白日说梦，与浪漫主义毫无共同之处。

综观苏曼殊的小说，虽然数量并不很多，题材也不够广泛，而且在思想和艺术方面都呈现出复杂的状况，但是在我国文学史上应该有它们的地位。第一，它们产生在旧民主主义革命由高潮转入低潮的辛亥革命前后，反映了这一时期革命的、进步的知识分子的革命要求和彷徨苦闷，在当时起过积极作用，在今天也有一定的认识价值。第二，苏曼殊是最早向西方小说学习的近代作家之一，他曾经试图吸收西方小说的长处，来丰富我国小说的表现手段，因而在我国小说的发展过程中起过积极作用。第三，中国资产阶级由于自身的弱点及其在历史舞台上活动时间的短暂，它在各个领域所取得的成就都极其有限。在文学方面尤其如此，据有人统计，资产阶级革命小说只有二十几种，而且大部分篇幅不长。苏曼殊是资产阶级革命小说的创始人之一，而且在辛亥革命失败之后，进步文学一片沉寂而落后文学泛滥猖獗的情况下，依然坚持以反袁、反帝、反封建为宗旨的小说创作，在艺术上也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因此，苏曼殊的小说在资产阶级革命小说中应占有重要地位。看不到苏曼殊小说在这些方面的积极贡献，不分青红皂白地把它们归入鸳鸯蝴蝶小说而加以一笔抹煞，显然是不公允的。